

“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”——怀念汤一介先生

“一介书生”的家学渊源

本报记者 王海涛 整理

20世纪40年代,在朱光潜先生主编的《文学研究》第三卷第三期刊登了诗人林庚写的一首诗,题目叫《生》,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在《生》的一侧写下了一首小诗《死》:“谁带给我一阵欢乐,难道死亡是痛苦,谁不信,春天死了,来的不是夏日”。这个年轻的学生就是汤一介。

而今,汤一介先生驾鹤西去。在北京大学人文楼1号楼的灵堂里,他的音容笑貌仍在,只是未名湖畔那快乐的两只小鸟飞走了一只。北大是汤先生一生的家园,哲学是汤先生终生的精神家园。

家学深厚——

祖孙三代

“事不避难,义不逃责”

9月9日晚,湖北省黄梅县下起了雨。秋雨中,汤一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家乡,给秋天的小城平添了一份悲凉。次日清晨,汤用彤纪念馆正式开馆,汤一介亲自设计了父亲的纪念馆,其间倾注大量心血,只是遗憾未能等到开馆这一天。

在黄梅县,汤家是著名的书香门第。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,做过甘肃渭源等县的知县和乡试同考官,晚年以授徒为业,喜吟《桃花扇》中的《哀江南》和庚信的《哀江南赋》。汤霖60岁生日时,曾在学生的祝寿图中“自题”：“余自念六十年来,始则困于举业,终乃劳于吏事……虽然,事不避难,义不逃责,素位而行,随适而安,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。时势迁流,今后变幻不可测,要当静以镇之,徐以俟之,毋戚戚于功名,毋孜孜于逸乐。”

汤一介的祖父在他出生13年前就去世了。汤一介甚至都没有见过祖父的画像或者是照片。虽没有见过祖父,但祖父在汤一介心中的地位却是无人可替代的。比如,汤一介同样偏爱庚信的《哀江南赋》;祖父为汤氏家族留下的“事不避难,义不逃责”家训,更是成为他做人做学问的准则。晚年以77岁高龄受命编纂《儒藏》,汤一介也将此视为在践行祖父“事不避难,义不逃责”的精神。《儒藏》收入儒家经典3000多种,约10亿字。今年6月27日,北大出版社举办《儒藏》百册发布会,病重的汤一介坚持出席致意。北大出版社员工陈稳回忆,因为身体虚弱,汤一介先生的讲话时长仅有4分钟,他讲话



▲ 1936年,汤一介(前排左一)与父亲汤用彤(后排右一)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园。(资料片)



▲ 年轻时的汤一介与乐黛云。(资料片)

中再三叮嘱同仁多“努力”,“汤老最后一句说的是:‘只要我活着一天,就一定为《儒藏》这个伟大的工程尽自己的一份力。’”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,北大校长王

恩哥专门以汤一介先生编《儒藏》的故事激励学生,“这种守正笃实、久久为功的精神,值得大家用心学习。”

汤霖还曾为汤家留下了一

张拓片,那是代表了他人生辉煌的进士碑拓片。作为光绪十六年的进士,汤霖的名字被刻在进士碑上,现在那块进士碑依然立在孔庙里,只是由于年久风化,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。

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早年留学哈佛大学,时与陈寅恪、吴宓并称“哈佛三杰”。1918年,汤用彤赴美留学,先入读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,1919年转入哈佛研究院,1922年由美国回国后,一直在大学教书办学。1931年,汤用彤应胡适邀请受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,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。1948年12月,蒋介石下令派飞机到北平“抢救”知名学者,汤用彤在“抢救”名单上,但是他没有选择搭机南下;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,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,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。“当时父亲以校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担当起北大的领导工作。这是父亲的‘义不逃责’。”汤一介说。

笔散文集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》。在书的序言里,汤一介写道:“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,是普普通通、飞不高、也飞不远的。他们喜欢自由,却常常身陷牢笼;他们向往逍遥,但总有俗事缠身!现在,小鸟已变成老鸟,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。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,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。”

这段话既反映了两人夫妻情深,也含蓄地说出了他们曾经历过的苦难。1958年,乐黛云被划为“右派”,还没等小孩满周岁,她就被派到乡下接受“劳动改造”。在乐黛云被下放农村的两年,汤一介每周一封信,每封信的开头均称妻子为“乐黛云同志”。在那样一个讲究阶级斗争的时代,汤一介此举被视为和“右派”妻子“划不清界限”,也遭到了批评。不过,汤一介不为所动,依然坚持在每封信里称呼妻子为“同志”,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乐黛云。

“文革”期间,汤一介被打为“黑帮”。在频繁的“隔离审查”中,乐黛云一直支持丈夫。汤一介去学校接受审查,乐黛云就守候在学校办公楼边的石阶上,等着丈夫出来。乐黛云后来回忆:“当时是很恐怖的,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,你永远再也找不着!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再也找不到汤一介。”

“文革”后,夫妻俩迎来学术的春天,未名湖畔的“两只小鸟”终于没了羁绊。汤一介的子女学的都是理科,从事也都是和传统文化无关的工作,一生钟爱中华文化的汤一介,有时也会苦恼:“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。”汤一介试着用儒家的“天下观”宽慰自己,“从天下观的角度看,我的后代成为美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,将来我们都将成为世界公民。”

伉俪情深——

夫妇在学术上比翼齐飞

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,以教书办学为业。晚年在为自己文集所撰的前言中,汤一介开篇的第一句话便是“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、编书中度过的。”

1947年,汤一介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。进入大学后,他心无旁骛,专心致力于哲学,在同学眼中,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、很有头脑的学生。1951年尚未从北大哲学系毕业,汤一介便留校在北大哲学系任教。他的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,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。

汤一介与乐黛云是学术界著名的伉俪。2005年,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共同出版了一本随

汤一介的三段往事

□卞毓方

偷了金子想去延安

1943年春,汤一介年交十六,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。他有四个好朋友,三个是同级,一个读初三。正值青春反叛期,他们对训导主任、童军教官极度不满,加之读了一本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,知道世上还有神奇的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,还有个地方叫“延安”。他们对延安产生向往,决定离校私奔。昆明在大西南,延安在陕北,中间隔着千山万水,要去,这路费从哪里来?五人一合计:偷家里的金子。汤一介偷的是一支金笔、一块金表、一块刻着他父亲汤用彤任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,其他人偷的是金戒指、金手镯之类。就地卖出去一部分,换了钱,随即上路。先乘火车去曲靖,继而搭运货的卡车去贵阳。到了贵阳,刚在小旅馆住下,就被得到学校通知的警察抓个正着。免不了受一番严厉的盘查,然后,由学校派人领回。延安的梦,就这样破灭了。

“今天想来,由昆明到延安,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是绝无可能的。”半个世纪后,汤一介分析,“延安没有去成对我也许是

幸运的,否则说不定会在延安‘整风’中呜呼哀哉!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。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相信‘命’的,可我真有点相信在冥冥中确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每个人。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,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,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,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,虽然经过许多苦难,可我们相依为命,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到今天,也许我得感谢贵阳警备司令部吧!乐黛云曾写了一篇散文《啊,延安……》,是说1948年时一批中国青年如何向往‘延安’这‘革命圣地’,但到头来,他们在四十多年的历次运动中经历着各式各样的悲惨命运。中国的一代一代青年总是被骗,总是怀着满腔热血,而在经历了四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,往往写出韦君宜同志的《思痛录》来。我多么希望不要再欺骗青年人了,而青年人应尽力远离那容易受欺骗的陷阱。”

进出市委党校

1947年,汤一介考进北大哲学系。1949年元月31日,北平宣布和平解放。5月,汤一介加入

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;11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在青年学生中,属于觉悟高、热情足的先进分子。1951年元月,汤一介大学尚未毕业,就被北大党委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深造,目的是把他培养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发展党员工作的“组织员”。

两个月后,党校方面发觉他性格内向,书生气重,不适宜担当“组织员”,就把他留在党校,改任教员。

北大党委只得重新派人,取代汤一介的,是一位姓华的学生党员。据欧阳中石对笔者回忆:此君很革命,也很真诚。革命符合潮流,真诚就很危险。结果,正是因为真诚,他把自己的前途也给革掉了——被贬去延庆县合作社当员工。

汤一介不愿意留在党校,他心底还残存着当“哲学家”的梦。因此,在党校教了几年“联共党史”、“中共党史”、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”、“马克思主义哲学”之后,1956年10月,他又回到了北大。

参加“梁效”写作组

“文革”初期,汤一介被打成

“黑帮分子”,饱受批判和折磨。1969年,下放江西农场劳改。1971年,汤一介从农场回到北大,担任哲学系教改组组长,负责给工农兵学员上课,算是重新起用。当时,有位教授觉得这批学生基本功差,连文章都写不通顺,建议让他们学点逻辑。汤一介同意了。这就引来了麻烦:有人贴大字报,说逻辑学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,汤一介的立场还没有从资产阶级那边转过来!稍后,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《古代哲学资料》,其中讲到孔子是由奴隶主转化成地主,和毛泽东的说法有所违背。(譬如:1968年10月,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,毛泽东说:“我这个人有点偏向,不那么喜欢孔夫子。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,旧贵族的观点,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。”)这还得了!有人据此发难,中华书局不得不赶紧做出检讨,汤一介是此书的编写者之一,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逃不脱的责任,这又给别人抓住了把柄。倘若事态照此发展,汤一介可能再次被打倒。

转机来了。1973年,清华大学整理了一份“林彪与孔孟之道”的材料,送呈毛泽东主席。毛

主席看后,认为不好,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,不懂这一块,要找一些北大的老师参加。北大党委闻风而动,派出了冯友兰、周一良、张世英、汤一介等参与其事,由是就诞生了后来臭名远扬的两校写作组——梁效。

若干年后,汤一介回忆:“我们每天编材料,写大批判的文章,还到各处去讲解‘林彪与孔孟之道’。比如:林彪说克己复礼,我们就说他的意思是想复辟资本主义。也是在那一年,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,江青找我们去给帛书做注解,编大字本给毛泽东看。1974年底的时候,江青到北大来,安排我给他讲老子。我心里很紧张,生怕说错话。可是我没讲几句,江青就开始发言了,那个会上基本上是我们听她讲老子。还有一次,我们陪同江青去天津视察,更让我见识了她的可怕,她的手下都是她让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。吃饭的时候,我不小心提到斯大林,她就大发脾气说:‘不要提斯大林!’”

“文革”结束,江青垮台,汤一介因为在“梁效”的经历,遭到隔离审查。不管当时有多少客观因素,汤一介真心反省:“我错了。”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